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论说及其学派的使命

张国栋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施特劳斯现代性“三次浪潮”的比喻借自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预见三次浪潮的内容和顺序, 他的三种正义观和现代性三次浪潮一一对应, 柏拉图揭示了政治事物的本性。施特劳斯通过柏拉图的分析看到政治事物的本性之后, 考虑如何改善现实政治共同体。他为此设想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 并将其设立为施特劳斯学派的使命。施特劳斯学派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 已与当代政治科学的主流汇通合流。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有其局限性, 需要进行数学化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施特劳斯; 现代性; 柏拉图; 《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3.01.017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论说与众不同。简·贝内特在权威的《牛津政治理论手册》中总结学界研究, 将现代性定性为“一种头脑的习惯及其制度化身”^{[1]212}, 概括了它的四个方面: 系统化、工具化、世俗化和去神秘化^{[1]214}。现代性的这四个方面被认为将不断发展, 永不停息^{[1]214}。

与此相反, 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这一重要论文中, 指出现代性并非线性发展, 而是经历了方向不同的三次浪潮, 并且我们无法乘着现代性永远向前, 而是需要重回西方传统的前现代思想^{[2]86-101}。

施特劳斯独特的现代性论述, 为其学派设置了独特的研究议程。检视施特劳斯学派为纪念其导师而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设立的, 颁给年度最佳政治哲学博士论文的“施特劳斯奖”, 可以看到, 除了一些不规则的情况外, 一部分颁给了对前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另一部分颁给了对现代性三次浪潮的研究^[3]。

由此可见, 施特劳斯学派的使命在于, 精研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并且力求复兴古典政治思想。

施特劳斯学派的使命何以从精研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并复兴古典政治思想, 转为建立一门“亚里士多德式的现代政治科学”的? 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有且只有三幕的历史长剧: 施特劳斯论现代性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最初作为演讲发表, 但并不带有演讲常见的随意性, 而是有着如钟表一般严密精细的结构, 见图 1^{[2]86-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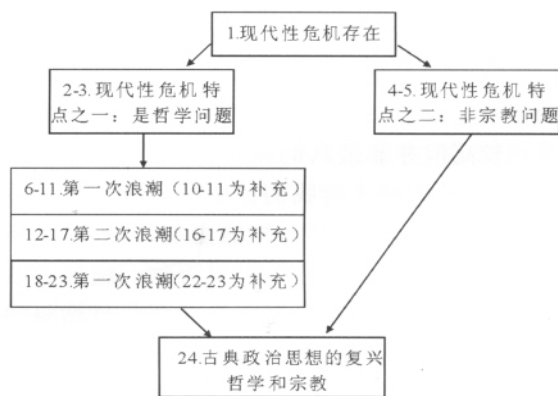


图1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之结构

此文开篇均分为两小部分的四个段落论述现代性危机的特点。中间十八段构成论述的主体, 均分为三小部分, 分别论述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每一小部分的结尾两段又均为补充性质。毫无疑问, 这是一篇有着几何对称之美的精心构造的杰作, 值得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 2012-10-12

作者简介: 张国栋(1982—), 男, 山西省太原市人,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当代政治理论研究。

施特劳斯一开始将西方的危机等同于现代性的危机,等同于西方人不再能分辨对错这一问题,进而等同于政治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因此,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论说,在本文落实为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之兴衰的论说。

(一)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

政治哲学力求辨明对错。马基雅维里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是错的,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序幕。他批评古典政治哲学错在追求最佳政治秩序,由此“要么导致不认真看待政治事务的结果(伊壁鸠鲁主义),要么便是借助一种臆想性完善状态来理解这些事务”^{[2]91}。为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事务,必须观察人们事实上如何生存而非应该如何生存。马基雅维里抛弃政治理想主义,对政治事务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这意味着,没有理想来判断现实政治行动的对错。他写出《君主论》为君主们献计献策,告知他们如何抛开道德顾虑、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获取利益,他也写出《李维史论》为共和主义者加油打气,告知他们该如何精明地阴谋反对君主^[4]。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马基雅维里在这两本书中都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5]12}。他并不偏爱其中的哪一本,他不仅在著作中保持中立,在人生中也乐意分别效力敌对双方^[6]。没有什么外在标准可以裁决政治冲突。政治只是行动者如何实现自身目标的技术问题。

施特劳斯比较对人之目标的古今看法。古典政治哲学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在整体中有一个比较高但并非最高的位置,人受外在标准约束,人的快乐依赖于对我们欲望的限制。现代观点与此相反,认可“人是万物的主宰”。人的欲望没有限制,人的目标是主宰世界万物。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自然科学与后一种立场相和谐。自然科学摧毁了古典目的论,也摧毁了对人的外在限制。科学被认为是“为了征服自然,为了对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系统化的控制”^{[2]92}。如果人的欲望不受限制,那么当权者势必要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做一切恶事。马基雅维里的观点走到极端变得荒谬。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和洛克提供了对马基雅维里的矫正,将他的洞见与“自然正当”结合而成为影响深刻的现代理论。霍布斯指出,人的自我保存依自然是正当的。而洛克进一步指出,舒适地自我保存是正当的。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危害其他人的舒适的自我保

存,这是不正确的。需要存在一个普遍的富裕而和平的社会,才能使得每一个人都正当地追求自己的舒适生存,而不危及他人的舒适生存。

(二)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

普遍的富裕与和平从未实现,战争与贫穷至今仍有待消灭的目标。马基雅维里自诩的现实主义,结出的仍然是“理想主义”的果实。为了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只能重新构造实现目标的手段,或者改变目标本身。卢梭在这两个方向都作了努力,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

首先,卢梭看到,普遍的富裕与和平并不真正能得到人之本性的支持。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表现在自然状态中。而卢梭指出,人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没有理性,野蛮而短视,不会欲望普遍的富裕与和平。此种欲望只可能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因此,这样一个社会不会自然到来,而只可能是无意识历史过程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只有在那时,人的理性充分发展,才能认识到为了自我保存需要共同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团体。在这样一个团体中,“所有社会成员均须同等地、完全地服从法律,而对于制定这些法律,每个人都必须能够有所贡献”^{[2]94}。通过这种立法过程,每个人的特殊意志都转化为普遍意志,每个人都无条件地服从这种普遍意志。施特劳斯随后指出,这最终意味着共产主义^{[2]101}。总之,卢梭重新构造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

其次,卢梭改变了所要实现的目标。施特劳斯指出,“卢梭还有另一个基本思想,其重要性一点都不弱于上面提到的部分”^{[2]96}。人本性上想要自由,并不想为了舒适生存而服从普遍意志以放弃自由。“人天然地乃是离群索居的”^{[7]275},人只有在社会之外,在孤独地与大自然的融合接触中才能真正快乐美好地生存。尽管如此,多数人却只能满足于舒适生存。

(三)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给出的图景十分灰暗。不仅普遍的富裕和平遥不可及,迄今未至,而且即便它真的到来,人们也无法在其中快乐美好地生存。尼采对卢梭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加以批评,开启了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首先,历史没有内在的方向或意义,不可能有顶峰或终结,并不必然向普遍意志的统治发展。卢梭的理想并不比其他人的社会理想更优越。未来会出现的,或许是普遍的富裕与和平,或许是压迫性的帝国主义。在尼采的时代,帝国主义席卷全球,征服他人的野心驱动着政治

行动者,由这种野心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到来。他们想要等级制社会,而非普遍的富裕与和平。征服他人的欲望跟舒适地自我保存的欲望一样,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并没有哪一种更加“自然”。没有什么外在标准可以判断何者优越,何者会最终胜出。

其次,尼采批评卢梭,认为“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2]98}。卢梭认为,人想要真正快乐美好且离群索居地生存,而尼采认为“无疑人的本性便是权力意志,而这在原初的层面上意味着超克他人的意志(will to overpower):出于自然本性,人是不会意欲平等的。人的愉悦源于超克他人,超克自身”^{[2]100}。卢梭的普遍意志的统治将在历史终结处实现,而尼采欲望的超人统治的等级制社会没有任何实现的保证。尼采只能自己欲望它的实现。见表 1。

表 1 现代性三次浪潮的特性

项目	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
代表人物	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	卢梭,康德,黑格尔	尼采
对人之本性的理解	想要舒适地生存	多数人只能舒适地生存,少数人想要快乐美好地生存	想要征服他人(will to overpower)
符合人性的政治共同体	普遍的富裕而和平的社会	普遍意志统治的社会	超人统治的自然等级制的社会
制度中的人	只想舒适地自我保存的个人	献身于共同体的人	超人与被统治者
何时可以实现	容易实现	当历史过程发展至顶峰时实现	没有保证,只是个人愿望

表 1 总结了现代性三次浪潮的特征。现代性从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出发,但所产生的三次浪潮都是理想主义的。不仅普遍富裕和平的社会、普遍意志统治的社会和超人统治的社会都没有到来,而且这三种政治理想互相冲突,没有哪种一定会实现。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这场演出了数百年的三幕长剧已经落幕^{[5]477},也就是说,现代性有且只有这三次浪潮。那么,为什么现代性有且只有这三次浪潮?为什么现代人只根据三种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

二、现代性何以有且只有三幕:施特劳斯论柏拉图

关于何为正确的思考,在现代产生了三次浪潮,在古代则产生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施特劳

斯在其《柏拉图》一文中说,“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同许多人讨论了正义的本性问题”^{[8]31}。施特劳斯要求复兴古典政治思想,因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结尾,直接导向《柏拉图》一文的开头。这两篇论文曾被收进同一文集,关联显而易见^[9]。它们拥有共同的主题,分别探讨了正义的古代和现代理论,需要读者对其并行思考。

施特劳斯在其《柏拉图》一文的开头部分,指出《理想国》第一卷给出了三种正义观^{[8]32}。柏拉图的三种正义观都以善的观念为基础:“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10]260}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10]261}。因此,人们之所以持有三种不同的正义观,根源在于对善看法不同。

第一种正义观由德高才丰的克法洛斯提出。他认为,善在于有充足财产并且不伤害他人^{[10]4-7}。他同时认为正义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苏格拉底批评他的观点自相矛盾。如果善是不伤害他人,那么把武器还给疯掉的朋友,或者把真实情况告知疯子,都并不正确。克法洛斯回避了讨论。其子玻勒马霍斯继续坚持“欠债还债就是正义”^{[10]7}。苏格拉底指出,人与人之间不只有金钱往来,而且有抢劫偷窃等非经济活动,也有医疗、航海、制鞋等技术活动。“欠债还钱”不足以判断此类行动是否正确,判断标准应该由此扩展为给予每个人他所应得的东西。玻勒马霍斯坚持将问题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动中,提出了第二种正义观:“我终归认为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是正义的。”^{[10]12}苏格拉底继续批评,指出这个标准同样不适用于音乐、骑马等人类行动。玻勒马霍斯无法回答,遂放弃自己的观点。此时,色拉叙马霍斯回应苏格拉底以统一标准判断人类行动之对错的挑战,提出第三种正义观:“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10]18}他认为,何为正义是法律所规定的。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对是错,只能根据法律^{[8]35}。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制定法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又由于谁强谁统治,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判断一个人的行动是否正确,标准在于这种行动是否能促进强者即统治者的利益。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他人是正确的。

第三种弱肉强食的正义观最为野蛮。由于人类社会是由野蛮走向文明,因此可以预期这种正

义观会最早出现。它在《理想国》的余下部分得到了优先讨论。

(一)第三种正义观

判断行为是否正确,标准是能否促进统治者的利益。这种观点在被统治者看来显然荒谬,和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一样需要矫正。施特劳斯指出,格劳孔在《理想国》的第二卷给出了这种矫正:“从本性上讲,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全然不关心他人的利益,乃至毫不犹豫地损害其同胞的利益。”^{[8]38}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判断对错,为此而立契约定法律,认为契约和法律是判断行为是否正确标准。正如对马基雅维里的纠正产生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对色拉叙马霍斯的纠正也产生了格劳孔的契约论。潘格尔继续施特劳斯的思考,研究并指出“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终点,正是《政府论两篇》的起点”^[11]。

正确的行为就是能满足人们利益的行为,而建立城邦对满足人的利益是必要的,因此讨论转向了如何正确建立城邦^{[8]39}。人们有吃穿住行的基本需要,城邦首先必须满足这些需要。在这个城邦中,判断人的行动是否正确标准,是能否更好地满足基本需要。因此,人们的正确行动在于分别专职从事不同的行业制造生活必需品^{[10]58-63}。

(二)第二种正义观

由于人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想要追逐舒适奢侈的生活,健康的城邦变成了“发高烧的城邦”^{[10]64}。正如西方在建立社会契约论之后发动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柏拉图笔下的早期城邦也开始发起战争^{[10]65}。战争中正确的行动是“帮助朋友并伤害敌人”,这正是玻勒马霍斯所提出的第二种正义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作的卡尔·施米特支持这种正义观,认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12]。

士兵随着战争而出现。为了防止士兵阶层转而去掠夺人民,变成“人民的敌人和暴君”^{[10]131},必须教育士兵,使他们放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第一种正义观,以能否促进集体利益来判断自己行动的对错。为了做到这一点,士兵必须完全献身于城邦,不能有任何不属于集体的私有物,这意味着要对财产和妇女儿童实行共产主义^{[8]48}。

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们并不真正快乐。人们之所以这样生活,只是由于理性压倒了欲望。对卢梭来说,为了普遍意志的统治能够实现,必须存

在一个历史的顶峰,使得所有人获得充足理性。对柏拉图来说,能得到治国理性的人总是少数,所以他并不期待理性的普及,而是希望少数获得充分理性的“护国者”去统治国家^{[10]147}。这个国家由生意人、士兵和护国者组成,正确的行动就是各行其职,做适合自己本性的工作^{[10]172}。

(三)第一种正义观

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们,和现代政治思想家们一样,同样怀疑理想城邦能否实现,同样发起了三次凶猛冲击的浪潮^{[10]178-212}。苏格拉底被迫捍卫自己的观点,证明这一城邦可以实现。

前述理想城邦由生意人、士兵和护国者构成。正如施特劳斯所认为的,“生意人和武士即使在正义城邦也不真正是正义的,因为他们的正义唯一来自这样或那样的习惯而非哲学;因此他们的灵魂深处渴望暴政,即渴望彻底的不正义。”^{[8]45} 因此这一城邦只可能由超凡的哲学家建立。苏格拉底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10]215}。

这个哲学家必须有惊人智慧为每个人安排适合他本性的工作,使他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他判断自己的行动是对是错的标准,在于有没有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工作和酬报。他持有的是《理想国》中最早提出的第一种正义观。

正如尼采所欲望的理想世界是自然等级制的,苏格拉底提出的正义国家也具有严格的自然等级制;尼采理想世界的实现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欲,正义国家的实现也只可能出于哲学家的意欲。

(四)政治事物的本性

由以上论证可见,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与柏拉图给出的三种正义观一一平行。如果预见性是判别是否科学的标准,那么柏拉图的理论无疑极为科学;他预见正义观只会出现三种,预见三种正义观的实质内容及出现顺序,预见“强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统治”的野蛮正义观会得到纠正或重述,而这种重述会形成社会契约论。

施特劳斯“三次浪潮”这个比喻借自《理想国》^{[10]212}。施特劳斯通过对柏拉图的研究揭示了“现代性”为什么有且只有三次浪潮。柏拉图指出,正义观派生自善的观点,也就是说,人们根据行动是产生好处还是坏处来判断对错。如果每个人只关心某种行动能否为自己带来好处,会产生第一次浪潮;如果一个人以自己和其他人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来判断对错,会产生第二次浪潮;如

果一个人判断对错时不考虑自己而只考虑其他人,结果会是第三次浪潮。

现代政治科学最终认可了这种分析。斯考克波总结了政治科学对政治行动者的动机以及对他们认为什么是善的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行动者追求自己和其他人的整体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行动者追求的是其他人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行动者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13]。由于人只可能从这三个角度判断对错,所以只会有三种正义观以及相应的三种政治理想,也因此现代性有且仅有三次浪潮。

施特劳斯对《理想国》的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想国》阐明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但是,像西塞罗所评论的那样,《理想国》没有阐明最可能好的政治制度,毋宁说只阐明了政治事物的本性——城邦的本性。”^{[8]65}

柏拉图阐明了政治事物的本性,但是还有必要阐明如何改善现实存在的城邦或国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因此而在古代产生。也因此,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展现自身之后,有必要形成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现代政治科学——这也是施特劳斯学派被认为应该承担的使命。

三、复兴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施特劳斯学派的使命

潘格尔在“施特劳斯路向的政治研究”一文中,总结了施特劳斯学派为建立亚里士多德式现代政治科学所作的努力。首先,潘格尔指出,施特劳斯学派认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应该以对政体或政治制度的研究为核心^[14]。这与 20 世纪中期“主流”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背道而驰。正如罗斯坦指出的,“行为主义时期在整体上忽视了政治制度分析”^[15]。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有了对政治制度关注的增强,以及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正如最新出版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中所说的,“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政治科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中心”^[16]。施特劳斯学派以一种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科学的强调最终得到了认可。

其次,潘格尔分类阐述了施特劳斯学派为建立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而作的具体努力^{[4]34-39}。潘格尔列举了施特劳斯派学者以制度为中心研究

政治经济学、政治心理学以及国际关系所产生的成果。潘格尔尤其强调了施特劳斯学派对美国政体的研究。他们不仅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司法、立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多有研究,而且研究了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等主题。

施特劳斯学派复兴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的努力,得到了非施派学者的呼应。亚里士多德对如何改善现有政体的最重要建议之一,是强化和巩固中产阶级^[17]。这一建议在 20 世纪之前完全被忽略。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亨廷顿等学者才重新发现了中产阶级对一个良好国家的重要性^[18]。

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的现代复兴,尤其还体现在“公民身份”的“重新发现”之上。公民身份这一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同样曾备受忽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政治学中少有人知,但在近 20 年中经历了蓬勃复兴^[19]。

总之,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建设亚里士多德式现代政治科学的努力,不仅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而且最终与当代政治科学合流汇通。但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有其局限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需要经过数学化的现代转换一样,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学同样如此。施特劳斯预见到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的必要性,但是他没能预料到对这种科学进行数学化转换的必要性。

四、结 语

施特劳斯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批评者和复兴古典政治思想的倡导者。本文证明,这一观点并不准确。

首先,施特劳斯可以说并没有批评现代性。他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中指出,现代性的危机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西方人不再肯定何为对错的危机。关于何为正确或正当的思考在现代形成了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在古代形成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施特劳斯自然会对两者一并思考。本文证明,施特劳斯比较两者所得出的结论是:柏拉图惊人地预见了这三次浪潮的实质内容以及出现顺序。批评现代性或现代政治哲学,无异于批评《理想国》或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本身。施特劳斯与其说要批评现代性,不如说是要揭示现代性,亦即揭示政治事物的实质本性。

其次,施特劳斯试图复兴的,并非泛泛而言的古典政治思想,而是特定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

科学。在揭示了政治事物的本性之后,下一步要做的是考虑如何改善现实政治共同体。由于20世纪中期主流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标榜价值中立并且不关心政治制度,所以他希望能建立一种以改善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因而,在现代复兴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成为施特劳斯学派的使命。施特劳斯学派复兴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科学的努力,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已经汇入当代政治科学的主流。但是他们的这一努力有其局限,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需要进行数学化的现代转换。

[参考文献]

- [1] Jane Bennett. Modernity and Its Critics[M]// 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Anne Phillip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施特劳斯.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 贺照田.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3] Leo Strauss Award[EB/OL]. [2011-03-22]http://www.apsanet.org/content_4126.cfm.
- [4] 马基雅维里. 论李维[M]. 冯克利,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5] 施特劳斯.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M]. 申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6] 毛里奇奥·维罗利. 尼可洛的微笑: 马基雅维里传[M]. 段保良,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7] 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彭刚,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 [8] 施特劳斯. 柏拉图[M]// 施特劳斯, 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9]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0]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托马斯·潘格尔. “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利坚立国: 一项批判[M]// 任军锋. 共和主义: 古典与现代.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69.
- [12] 卡尔·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M]. 刘宗坤,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06.
- [13] 西达·斯考克波. 绪论[M]// 彼得·埃文斯,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西达·斯考克波. 找回国家.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18-20.
- [14] Thomas L. Pangle. Straussia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M]// Gerald F Gaus, Chandran Kukathas,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32-34.
- [15] 鲍·罗思坦. 政治制度: 综述[M]// 罗伯特·古丁, 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 政治科学新手册.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205.
- [16] Rhodes R A W, Sarah A. Binder, Bert A. Rock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 [17]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04-210.
- [18]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李盛平, 杨玉生,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19] Susan D. Collins. Aristotle and the Rediscovery of Citizenship[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责任编辑 文 格)

Leo Strauss' Modernity Theory and the Mission of the Straussian School

ZHANG Guo-d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Leo Strauss's metaphor of "three waves" in his modernity theory was borrowed from Plato's *Republic*. Plato had foreseen the contents and sequence of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corresponding with his three views of justice. Plato had reveale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ings. After seeing the nature through Plato's analysis, Strauss started to consider how to improve the real political community. Consequently, he wanted to establish a modern Aristotelian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had been set as the mission of the Straussian School. The Straussian School's efforts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nd met the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of political science. However, the Aristotelian political science has its limitations; it ha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new modern mathematical version.

Key words: Leo Strauss; modernity; Plato; *Republic*; Aristotle